

历史将 宣判我无罪

菲·卡斯特罗

世界知識出版社

Fidel Castro
LA HISTORIA ME ABSOLVERA

La Imprenta Nacional

de Cuba, 1961

根据古巴国家印刷局 1961 年版译出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

[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后圆恩寺 3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101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 0.40 元

1962 年 7 月第一版 1962 年 7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张 $3\frac{1}{2}$ · 字数 59,000

统一书号 3003 · 643

統一書號：3003·643

定 价：0.40 元

序 言

1953年10月16日，是我国人民革命史上一个偉大的日子。那天，菲德尔·卡斯特罗在設立于古巴圣地亚哥市立医院一个小房間的法庭上，不但控訴了1952年3月10日政变后建立的独裁政权，而且控訴了五十年来阻碍着古巴国家的政治发展的整个殖民地政权。这位二十六岁的青年革命家，从被告变成了无可怀疑的原告，他譴責了古巴的和人民的敌人，历数了籠罩着祖国的一片烏烟瘴气。

菲德尔·卡斯特罗不仅控訴了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种种暴行、腐敗和叛国行为，并以感人的言詞綜述了臭名远揚的普拉特修正案通过以来影响着国家生活各个方面的严重危机，同时，他还十分明确地規定了一整个革命阶段的綱領的主要方針：土地改革，教育改革，住宅政策，民族独立的政策，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团結一致，把外資企业收归国有，工业化，等等。

在他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自我辯护詞中，菲德尔·卡斯特罗真实地反映了攻打蒙卡达兵营事件的意义。1953年7月26日的事件，不是一次旨在推翻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专制政府的冒险行动，而是革命的第一个澎湃的浪涛，这一革命将为整个拉丁美洲的生活开創一个新的解放的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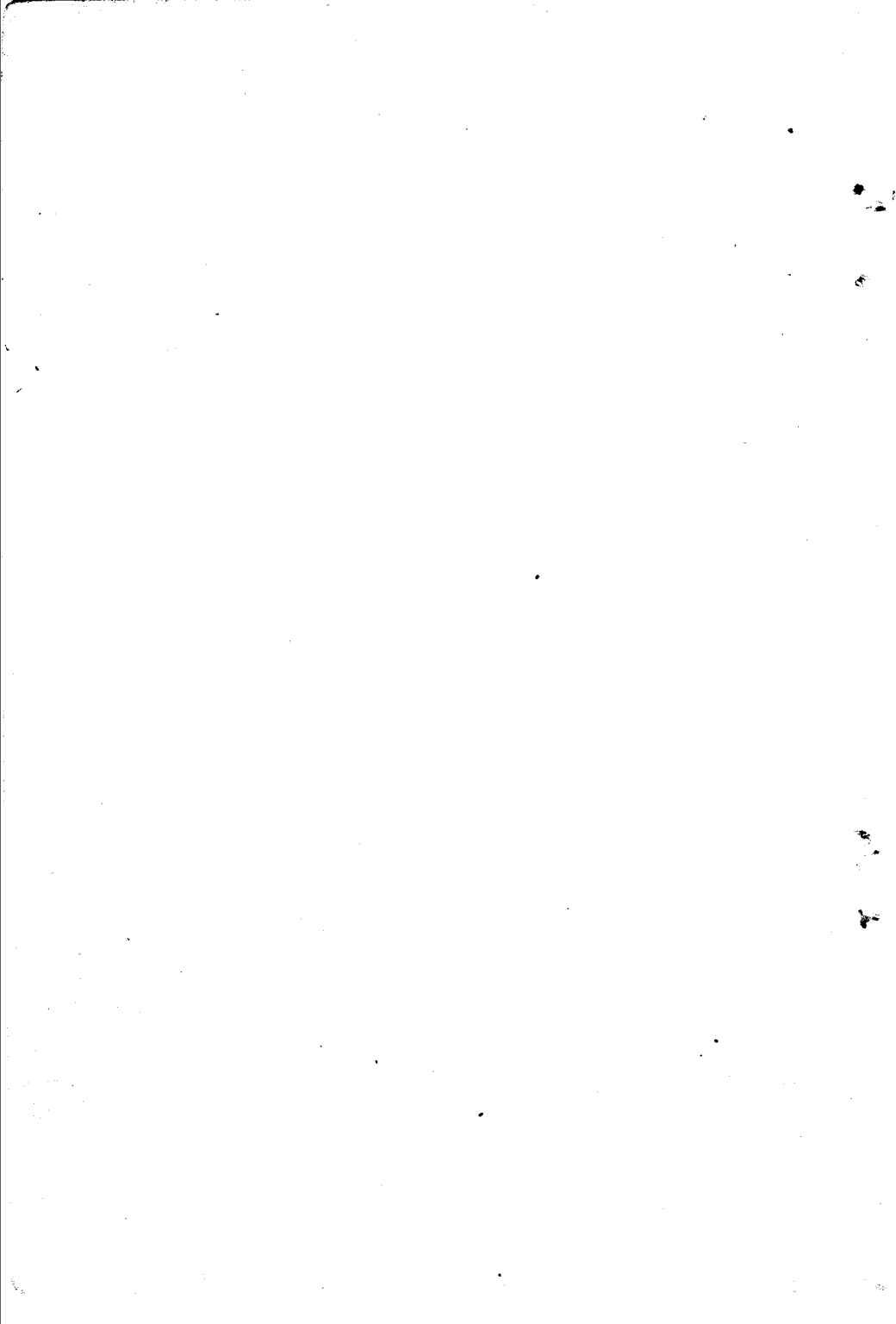
《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光辉地說明：以菲德尔·卡斯特罗为首的攻打蒙卡达兵营的英勇战士們，原来打算夺取古巴島最东，

端的那个兵营，建立一个革命根据地，以便发动全国各阶层的爱国人民来反对亲帝国主义的暴政。这是非常正确的。因此，攻打蒙卡达兵营的行动在军事上虽然失败了，但从古巴革命运动的政治和思想方面来说则是一个胜利。攻打蒙卡达兵营的行动向广大的城乡人民群众展示了武装斗争的客观可能性；攻打蒙卡达兵营的行动和7月26日革命运动的诞生，在把各个传统党派排除出政治舞台方面走了第一步。这些传统党派由于屈从美国国务院，由于迷信所谓地理宿命论和给特权阶级当差，完全没有能力对古巴和古巴人民的问题求得正确的、革命的解决。只有像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战友那样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他们具有真正的革命思想，都准备忍受最大的牺牲，来争取实现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必要改革。

这就是被告担起辩护律师的任务时所作的这个不平常的辩护词中所包含的主要政治教训。同时，《历史将宣判我无罪》有着伟大的道义内容。菲德尔·卡斯特罗体现我国人民的最优秀品质，向屠杀人民的刽子手凛然地表达了他对古巴民族的创造力的坚强信心。他歌颂了人民举行起义来打破不正义的枷锁的神圣权利。他的辩护词通篇闪耀着义务感、负责精神、爱国主义以及爱自由、爱正义、爱人类尊严的无比光辉。这是对整个拉丁美洲的年青一代进行勇敢和英雄主义教育的多么辉煌的一课！这是对人民反抗压迫的能力的多么大的信任！对古巴民族举行起义的前途又是一种多么不可动摇的信心！只有那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只有那些在任何斗争环境里都保持对人民白璧无瑕的赤诚的人，才会有这样的感情。“我们降生在我們的祖先傳給我們的自由的国度里，与其淪为奴隶，宁可让（使）这个岛屿在大海中沉没。”

現在，美帝国主义威胁着要对古巴革命进行直接的侵犯。在这样的時候，这些话是表达信心，是全国絕大多数人民一致的願望。

革命胜利后，《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印行过好几次。今年是“教育年”，国家印刷局决定大量出版这一历史文献。在我国光荣的历史上这一决定性的时刻，我国千千万万城乡人民为了革命的最高利益，将能够在这个文献中吸取关于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和尊严的教訓。



朱

諸位法官先生：

從來沒有過任何一個辯護律師得在這樣困難的條件下進行工作；也從來沒有過任何一個被告遭到過这么多的嚴重的非法待遇。在本案中，辯護律師和被告是同一個人。我作為辯護律師，連看一下起訴書也沒有可能；作為被告，我被關閉在完全與外界隔絕的單人牢房已經有七十六天，這是違反一切人道的和法律的規定的。

講話人絕對厭惡幼稚的自負，沒有心情、而且生性也不善于夸夸其談和作什麼聳人聽聞的事情。我不得不在這個法庭上自己擔任自己的辯護人，是由于兩個原因：第一，是因為實際上完全剝奪了我的受辯護權；第二，是因為只有感受至深的人，眼見祖國受到那樣深重的災難、正義遭到那樣踐踏的人，才能在這樣的場合嘔心瀝血講出凝結着真理的話來。

並非沒有慷慨的朋友願意為我作辯護。哈瓦那律師公會為我指定了一位有才干有勇氣的律師：豪爾赫·帕格列里博士，他是本城律師公會的主席。但是他卻不能執行他的使命。他每次想來探望我，都被拒于監獄門外。只是經過一個半月之後，由於法庭的干預，才允許他當着軍事情報局的一個軍曹的面會見我十分鐘。按常理說，一個律師是應該和他的當事人單獨交談的，這是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受到尊重的權利，只有這裡是例外，在這裡一個當了戰俘的古巴人落到了鐵石心腸的專制當局手中，他

們是不講什麼法理人情的。帕格列里博士和我都不能容忍對於我們準備在出庭時用的辯護策略進行這種卑污的刺探。難道他們想預先知道我們用什么方法粉碎他們就蒙卡達兵營事件挖空心思地捏造的無稽謊言，用什么方法揭露他們所竭力掩蓋的可怕的真相嗎？於是，當時我們就決定由我運用我的律師資格，自作辯護。

軍事情報局的軍曹聽到了這個決定，報告了他的上級，這引起了異常的恐懼，就好像是哪個調皮搗蛋的妖怪捉弄他們，使他們感到他們的一切計劃都要破產了。諸位法官先生，他們為了把被告自我辯護這樣一個在古巴有着悠久傳統的神聖權利也給我剝奪掉，而施加了多少壓力，你們是最清楚不過了。法庭不能向這種企圖讓步，因為這等於陷被告於毫無保障的境地。被告現在行使這項權利，該說的就說，絕不因任何理由而有所保留。我認為首先有必要說明對我實行野蠻的隔離的理由是什麼，不讓我講話的意圖是什麼；為什麼，如法庭所知，要陰謀殺害我；有哪些嚴重的事件他們不想讓人民知道；在本案中發生的一切奇奇怪怪的事情其奧妙何在。這就是我準備清楚地表白的一切。

你們曾公开地把这次审判称为共和国史上最重大的一次审判。如果你们当真这样想，你们就不该容许别人一再嘲弄你们的职权，使审讯沦为丑剧。第一次开庭是在9月21日。那天在被告席上坐了一百多人，四周是上百挺机枪和刺刀——这些东西可耻地闖进了法庭。絕大部分被告都与事件无关，他們在镇压机关的地牢里受到各种凌辱和虐待之后，又被拘押了好多天。剩下的那部分被告雄糾糾地挺立着，准备自豪地承认他們参加了爭取自由的战斗，作出罕見的自我牺牲的榜样，而把那些在本案中被陷害的人，从监狱的虎口里解救出来。曾經交战过的人们，又一次面对面了。正义仍旧在我們一边，我們將又一次展开真理对謊言的激烈战斗。可以肯定，現政权沒有預想到它在道义上的崩潰就在眼前。

現政权怎么能够維持得住所有这些誣告呢？既然有这么多的青年准备冒一切危險——監禁、拷打，如果必要的話，死亡——在法庭面前揭露事实真相，現政权又怎么能够阻止得了人們了解实际发生的事情呢？

第一次开庭的时候，我受到訊問，审問了我两个小时。我回答了檢察官先生和二十位辯护律師的問題。我以准确的数字和无法辯駁的資料证实我們一共花掉多少錢，这些錢是怎样得来的，我們收集到哪些武器。沒有什么需要隱瞞的，因为这一切都是以我們共和国的战斗史上少有的自我牺牲获得的。^①我談到

了鼓舞我們斗争的目的和我們对待敌人一贯坚持的人道和寬大的作風。如果說我能够完成我的任务，证实了所有被无辜地牽連在本案中的被告沒有直接或間接参加活动的話，这是因为我的英勇的同伴們的众口一詞地支持我的說法。我說过，他們是絕不会由于要承担后果，而对革命者和爱国者的身份感到羞愧和后悔的。在監獄里，我从未获准同他們交談，然而我們想作的，却是完完全全一样。这是因为，当人們的心中怀着同一的理想时，不管是監獄的牆壁还是墓地的泥土，什么都不能把他們隔絕开来；因为同一的怀念，同一的心灵，同一的思想，同一的良知，同一的自尊心，激励着他們所有的人。

从那时起，政府就蒙卡达事件所搭起的无耻謊言的樓閣，就开始像紙扎的房子一样地倒塌了。結果，檢察官先生也意識到把所有被指控为煽动者的人都关在監獄里是多么荒唐，他立即要求暫時釋放他們。

我在第一次开庭中結束了我的供詞后，曾請求法庭允許我离开被告席，而坐在辯护律師席上。在这一点上，我的确获得了許可。于是，就开始了我在这次审判中我认为最重要的使命：彻底粉碎攻击我們的战士們的怯懦、卑鄙、阴險、无耻的誣蔑，不可爭辯地揭露对俘虏犯下的可怖可恶的罪行，让全民族和全世界都看到我国人民的无限灾难，他們正在遭受着他們全部历史上最凶殘、最不人道的压迫。

第二次开庭是在9月22日，星期二。提出証詞的才不过十个人，就已經使在曼薩尼罗地区犯下的謀杀罪行揭露无遺了，特别是明确了并且清楚地記錄下了那个地区軍事駐营地长官的直接責任。还有三百人未曾作証呢。如果我根据汇集起来的大批材料和证据在法庭上盘問那些对謀杀事件直接負責的軍人們

本人的話，結果會怎樣呢？現政權能夠允許我在旁聽審判的許多人面前，當着來自全島各地的報界記者和律師，以及反對黨的領袖們——這些人被愚蠢地放在被告席上，結果是他們把這裡談論的一切都能聽得一清二楚——這樣作嗎？現政府寧可把法院連同所有的法官炸得粉碎也不能讓這樣的事發生！^②

他們想阻撓我出席審判，並且為此使用了軍事手段。9月25日星期五的晚間，第三次开庭的前夕，兩位刑事法醫來到了我的牢房。看得出來他們都很沉悶。“我們來給你作一次檢查”，——他們對我說。“是誰這麼關心我的健康呢？”——我問他們。實際上，我一看到他們，就已明白來意。他們也算是够大方的了，都對我讲了實話；那天下午監獄里來了一個查維亞諾上校，他對他們說，我“在審判中對政府極其不利”，並且吩咐他們簽署一個證書，說我有病，不能出庭。醫生們對我表示，他們自己是準備辭掉他們的職務去承受迫害的。他們把問題交給我自已處理。我不忍心要他們作這種自我犧牲，但是我也決不容許那種企圖得逞。我想把這件事交給他們自己的良知去判斷，就僅僅答复他們說：“你們該知道什麼是你們的責任；我自己的責任我很了解。”

之後他們就离开了，並且簽發了證書。我知道，他們之所以這樣作是因為他們以為，我的生命已陷於極端危險之中，並且好心地認為，這樣作是挽救我的性命的唯一方式。關於那次談話，我並不曾承擔保守秘密的義務；我只是對事實負責。在這裡講出來，會有損於那兩位善良的自由職業者的物質利益，但是他們的榮譽是被洗刷清白了——而這一點要有價值得多。當天晚上我就給法庭寫了一封信，揭露策劃中的陰謀，要求派兩位法醫來鑑定我的良好的健康狀況，我還向你們說明，如果為了挽救我的

性命，我就得同他們串通一氣，進行這樣的欺騙的話，那末我是千百倍地寧願犧牲性命的。為了表明我決心要單獨一個人對這種卑鄙伎倆展開鬥爭，我在信中还加上了導師馬蒂的思想：“一項正義的事業，起自山洞的洞底，可以勝過千軍萬馬。”這封信，正如本庭所知道的，就是梅爾瓦·埃爾南德斯博士在9月26日第三次開庭時所提出的信件。儘管我處在嚴密的監視下，我还是把信送到了她的手中。不用說，這封信立即引起了報復：埃爾南德斯博士被隔離看管，而對我呢，由於我本來就已被隔離，就把我遷到監獄中最最冷落的地方。從那時起，所有的被告在出庭以前都要從頭到腳仔細地搜查一遍。^③

27日來了兩位法醫，他們証實了我的健康狀況確實良好。然而這以後，不管法院怎樣一再下令，我却再也沒有被帶到法庭上去過。還不止于此，有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天天散發出百上千偽造的小冊子，胡說什麼要把我從獄中劫出來，這是一種笨拙的賊喊捉賊的把戲，實際上是企圖借口越獄而加害於我。這一企圖由於警惕的朋友們及時揭露而未能得逞，同時第一個醫師證書的虛偽性也被揭破，他們要想阻撓我出庭就只好公開無耻地藐視法庭的命令了。

諸位法官先生，這裡所發生的現象是非常罕見的：現政權害怕將被告帶到法庭上來；一個恐怖和血腥的政權懼怕一個手無寸鐵、遭到禁閉和誣蔑的人的道義信念。這樣，在剝奪了我的一切之後，又剝奪了我作為一名主要被告出庭的權利。請注意，所有這些都發生在停止一切公民保障、嚴格地執行公共秩序法^④以及對廣播、報紙新聞進行檢查的時候。現政權該是犯下了何等駭人的罪行，才會這樣懼怕一個被告的聲音啊！

我應該強調指出陸軍將領們一向對你們所持的傲慢不恭的

态度。法庭一再下令停止施加于我的非人的隔离，一再下令尊重我的最起码的权利，一再要求将我交付审判，然而这些要求从未受到尊重，所有这些法庭的命令一个一个地都遭到抗拒。不仅如此，在第一次和第二次开庭时，就在法庭上，在我身旁布下了一道卫队防綫，阻止我同任何人讲话——那怕是在短短的休息的时候，这表明他们不仅在监狱里，而且即使是在法庭上，在你们各位面前，也丝毫不理会你们的规定。我原打算在下次出庭时把它作为一个法院的起码的荣誉的问题提出来，但是，我再也沒有机会出庭了。他们作出了那些傲慢不恭的事之后，终于把我们带到这儿来，为的是要你们以法律的名义——而恰恰是他们，也仅仅是他们从3月10日以来一直在蹂躏那些法律——把我们送进监狱，这样看来他们所要强加给你们的角色实在是极其可悲的。“願武器順从袍服”的拉丁諺語在这里一次也沒有实现过。我要求你们多多注意这种情况。

但是，所有这些手段到头来都是完全徒劳的，因为我的勇敢的伙伴们以空前的爱国精神，出色地履行了他们的責任。

“不錯，我們是为古巴的自由而战斗，我們决不为此而反悔。”当他们被傳去訊問的时候，大家都这样說，并且跟着就以令人感动的勇气向法庭揭露在我们的弟兄們的身上犯下的可怕的罪行。虽然我不在场，但是由于博尼亚托监狱的难友們的帮助，我能够足不出牢房而了解审判的全部詳情，难友們不顾任何严厉惩罚的威胁，运用各种机智的方法将剪报和各种情报傳到我的手中。他們就这样地报复监狱长塔沃亚达和副监狱官罗薩瓦尔的胡作非为，这两个人让他们一天到晚地劳动，修建私人別墅，貪污他們的生活費，讓他們挨餓。

随着审判的进展，双方扮演的角色顛倒了过来；告人的，結

果成了被告，而被告却变成了原告。在那里受审的不是革命者，而是一位叫作巴蒂斯塔先生……杀人魔王！……如果明天这个独裁者和他的残忍的走狗们会遭到人民的判决的话，那么这些勇敢而高尚的青年人现在受到判决又算得了什么呢。他们被送往松树岛，在那里的环形牢房里，卡斯特尔斯^⑤的幽灵还在徘徊，无数受害者的呼声还萦绕在人们耳中。他们被带到那里，离乡背井，隔绝在社会之外，禁闭在苦狱之中，以磨灭他们对自由的热爱。难道你们不认为，正像我所说的，这样的情况对本律师履行他的使命来说是不愉快的和困难的吗？

经过这些卑污和非法的阴谋以后，根据发号施令者的意志，也由于开庭审判者的软弱，我被押送到了市立医院这个小房间里，在这里对我进行秘密审判，让别人听不到我的讲话，使任何人都无法知道我说了些什么。那末，庄严的司法大厦又作什么呢？毫无疑问，法官先生们在那里要感到舒适得多。我提醒你们注意一点：在这样一个由带着锋利的刺刀的哨兵包围着的医院里设立法庭是不合适的，因为人民可能认为我们的司法病了……被监禁了……

我提醒你们注意，你们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审判应当“公开进行，允许旁听”^⑥；然而这次开庭却绝对不许人民出庭旁听。只有两名律师和六名记者获准出庭，而记者所代表的报纸却因新闻检查而不能发表片言只语。我看到，在这个房间里和走廊上，我所仅有的听众是百来名士兵和军官。这样亲切地认真关怀我，太叫我感谢了！但愿整个军队都到这里来！我知道，总有那么一天，他们会急切地希望洗净一小批没有灵魂的人为实现自己的野心而在他们的军服上溅上的耻辱和血的污点。到那一天，那些今天逍遥自在地骑在高尚的士兵背上的人们可够瞧的

了！……当然这是假定人民沒有早就把他們打倒的話。

最后我應該說，我在獄中不能拿到任何論述刑法的著作。我手头只有一部薄薄的法典，這是一位律師——為我的同志們辯護的英勇的包迪利奧·卡斯特利亞諾斯博士剛剛借給我的。他們也不許我得到馬蒂的著作；看來，監獄的檢查當局認為這些著作是太富于顛覆性了。也許是因為我說過馬蒂是7月26日事件的主謀的緣故吧？^⑦

此外還禁止我攜帶有關任何其他問題的參考書出庭。這一點也沒關係！導師馬蒂的學說我銘刻在心，一切曾保卫各國人民自由的人們的崇高理想，全都保留在我的腦海中。

我對法庭只有一個要求，我希望，為了補償被告在得不到法律保護的情況下所遭受的無數侮辱和虐待，法庭應允我這一要求，即尊重我完全自由地表達我的意見的權利。不這樣的話，就連一點表面的公正也沒有了，那麼這次審判的最後的插曲將是空前的耻辱和卑怯。

我承認，我感到有點失望。我原來以為，檢察官先生會提出一個嚴重的控告，會充分說明，根據什麼論點和什麼理由來以法律和正義的名義（什麼法律，什麼正義？！）判處我二十六年徒刑。然而沒有這樣；他只是宣讀了社會保安法第一百四十八條，根據這條以及加重處分的規定，要求判處我二十六年徒刑。我認為，要求把一個人送到不見天日的地方關四分之一世紀，只花兩分鐘提出要求和陳述理由，那是太少了。也許檢察官先生對法庭感到不滿意吧？因為，據我看到，他在本案上三言兩語了事的态度，同法官先生們矜持地宣布這是一場重要審訊的莊嚴口吻對照起來，簡直是開玩笑。因為，我曾經看到過，有些檢察官先生在一件小小的販毒案上作十倍長的滔滔發言，而只不過要求判某個

公民六個月徒刑。檢察官先生沒有就他的主張申述任何理由。我是公道的，……我明白，一個檢察官既然曾經宣誓忠誠于共和國憲法，要他到這里來代表一個不合憲法的、以法規為依據的、沒有任何法律和道義基礎的事實上的政府，要求把一個古巴青年，一個像他一樣的律師，一個……也許像他一樣正直的人判處二十六年徒刑，那是很為難的。然而檢察官先生是一位有才能的人，我曾看到許多才能比他差得遠的人寫下長篇累牘的東西，為這個政權辯護。那麼，怎能認為他是缺乏為此辯護的理由，怎能認為——不論任何正直的人對此是感到如何厭惡——他那怕是談一刻鐘也不成呢？毫無疑問，這一切隱藏着幕後的大陰謀。

諸位法官先生：為什麼他們極力要使我沉默呢？為什麼甚至不提出任何申述，讓我可以有一個駁斥的目標呢？難道完全缺乏任何法律、道義和政治的根據，竟不能就這個問題提出一個嚴肅的論點嗎？難道是這樣害怕真理嗎？難道是希望我也只講兩分鐘，而不涉及那些自7月26日以來就使某些人夜不成眠的問題嗎？檢察官的起訴書只限于抄錄社會保安法的一條五行字的條文，難道他們以為，我也只糾纏在這一點上，像一個奴隸推磨那樣，只圍繞着這幾行字打轉嗎？但是，我絕不接受這種約束，因為在這次審判中，所爭論的不僅僅是某一個人的自由的問題，而是討論根本的原則問題，是人的自由權利遭到審訊、我們作為文明的民主國家存在的基礎受到威脅的問題。我不希望，當這次審判結束時，我會因為不曾為某些原則辯護，不曾說出某些真理，不曾譴責某些罪行而負疚。

檢察官先生這篇短短的大作不值得花一分鐘答復。我暫時只打算在法律上對它作一番小小的辯駁，因為我打算先掃清戰場，以便隨後對一切謊言、欺騙、偽善、因循苟且和道德上的卑怯